

「住房二元制」夢想可成真



現在，高房價成為讓全社會最為頭痛的問題之一。這次「兩會」，從會上到會下，大家最願意探討的一個問題，就是高房價和如何遏制高房價。筆者注意到，一些委員異口同聲地建議政府實行「住房二元制」，即一頭是面向廣大工薪階層的公租房，一頭是可以自由交易的商品房。公租房由政府建與管。除此之外的住房均進入市場，成為商品房，由市場監管，房價可自由波動，房子可自由交易，政府不干預。

築起一道「隔離牆」

筆者認為，「住房二元制」值得一試，因為它切中問題的要害，確能為政府解決百姓住不起房的問題提供有價值的思路。

「住房二元制」什麼樣？筆者想像，它就像一道清晰的「分界線」或是一堵有力的「隔離牆」。牆內，是住房計劃體制，唯一的住房是公租房，由政府統一興建和全程監管，產權國有。公租房是否足夠、公租房從布局、設計、質量到價格是否適合租住者、哪些人需要得到租房補貼等等一系列事宜，均由政府或其代理人全權處理。牆外，則是住房市場體制，遵循市場規則，按市場規律辦事，由市場監管。各類商品房可自由買賣，但參與者要依法行事。房價和地價均可隨需求變化自由波動，政府不干預。

可以想像，牆外，會有「四季」，可以有「春天」，也會經歷「嚴冬」；牆內，則「四季如春」，永遠是一片春天的景象：房子雖小，設施簡陋，產權不屬於自己，但居住者住着輕鬆、倍感溫馨，因為他們再沒有還房貸或「無房可居」的壓力了。牆外，人員繁雜，買家、賣家、炒家……牆內，只有居者或住家。

境外經驗可借鑒

還可以想像，「住房二元制」的作用可以是「井水不犯河水」，即你炒你的房，我住我的屋，互不影響。內地房價一直居高不下的事實表明，進入市場體制的住房只能由市場去管，政府想管也管不了。「住房二元制」建立的目的，實質就是明確市場與政府各自職能，讓二者各司其職、各展其能。建立「住房二元制」，香港和新加坡早已做出很好的示範，想必中央政府這一「二次房改」，不用再「摸着石頭過河」了，完全可以靠「拿來主義」，做到一步到位。希望「住房二元制」能早日夢想成真。

作者為企業策劃人

敢於說真話

□徐光木

近日，全國政協常委張維慶發言時，對一些地方的用人不正之風、不講真話、難聽到真話的會風等問題逐一剖析，見諸媒體後引發網民強烈共鳴。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牟新生表示，譬如有關領導下去視察，當地都預先進行了周密部署，安排得非常具體，領導人成了一個「機器」，這是很可悲的。還有的領導去視察，周圍幾十個人前呼後擁，大部分都是民警和幹部化裝的，全是假的。

不得不承認，牟新生的「爆料」非常之猛。領導的行蹤被安排了，前呼後擁的人被內定了，領導能夠看到的當然只能是一派鶯歌燕舞、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

當然，牟新生的「爆料」誠然振聾發聵，但是，令我非常遺憾的是，敢於說真話的牟新生已經67歲高齡，已經名副其實地退居二線。也許有人會問，敢於說真話的領導幹部緣何都退居二線，年齡大和敢說真話有必然聯繫嗎？從理論上講，兩者的確沒關係，可現實是兩者的聯繫非常緊密。這是因為，一個人，特別是領導幹部一旦退居二線，就可以說是無後顧之憂了。一來，他們的官位不可能再長進；二來，就算是說了真話，說了難聽的話，誰也不能拿他們怎麼樣。我想，這正是張維慶、牟新生等極少數人敢說真話的最主要原因。其他的更多人，當然也包括領導幹部，他們並不是不想說真話，而是在兩會這樣的正式場合不敢說真話。

說真話從來都不是「退居二線」官員的專利，也不是讓極少數人冒着掉烏紗的風險所應該做的事情，而應該是一種常態和主流。我國憲法就明確規定：全國人大代表在全國人大各種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不受法律追究。這等於是給了代表委員們一頂仗義執言的尚方寶劍。可是，就目前而言，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代表委員們會不會用，而在於依據憲法的規定建立一整套保障機制，讓代表委員們敢於說真話，樂於說真話。

馬應以「調和」改變逆境

□吳 非

馬英九在台灣行政政策的執行過程中，主要的問題不在於選舉和民進黨的騷擾，而是對於公務人員體系把握不住。當大陸政府對於馬英九的讓利越來越大時，好像台灣民眾的擔心也越來越大。馬英九需要在人事文化中多做一些調和，可能有助於改變逆境。



《中國時報》3月9日報道，馬英九上台後強打「清廉牌」，在外商眼中卻毫無效果，最新一期政經風險評估報告顯示，台灣在亞洲四小龍中貪污情況最嚴重。

這項針對包括美國、澳洲與亞太地區總共16個國家與地區，共計2100多名商人所做的調查報告顯示，最貪污的第一名是印尼，第二名是柬埔寨，第三名是越南。台灣今年名列第九，僅比名列第七的大陸好一點。

如何理解台灣出現的貪污問題呢？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台行政單位人事問題上存在嚴重結構性問題，就是閩南人事特點和台灣1949年後形成的，以及後來由留美學生從美國帶來的多元文化嚴重衝突，並且在民主化和選舉中形成了完全不能調和的狀態，甚至變為藍綠對立。

把握不住公務人員

自八八水災後，馬英九主要在健保費用上漲、台北市房屋價格快速上漲、改變公務人員體系評價以及軍公教稅率調漲問題上面對嚴重的挑戰。這些挑戰基本上不是來自於民進黨。民進黨政策會的研究表明，現階段民進黨所進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台灣產業發展、ECFA專題、國際評比、地方自治、台灣願景、MOU和江陳會上，可以說民進黨的研究基本上和馬英九的政策沒有太大的聯繫。馬英九在台灣行政政策的執行過程中，主要的問題不在於選舉和民進黨的騷擾，而是對於公務人員體系的掌握力不足。

馬英九在健保費用調漲的過程中，基本沒有掌握到問題的實質核心。健保是每一個台灣民眾都希望維持下去的，現在健保已經虧空近千億台幣，这其中台北市積欠百多億，高雄市積欠一百多億。另外一個問題在於民眾看病時，由於不自覺而有多拿藥的問題。儘管很多門診部門已經採取措施，就是每一次只開三天的藥，但很多的年長病者沒事就經常到門診拿藥，這樣使得台灣建立的非常好的健保面臨破產的邊緣。因此，不讓健保破產必須要多

管齊下，建立衛生單位和財務部門、醫院間的合作關係，進行追討和藥品控管，最後才是採取上漲健保費用等措施。

在房屋問題上，2009年台灣公有財產局賣出土地232公頃，主要集中在台北市。因為房價高，台北市人口遷出2萬人，這些人主要遷往台北縣。台北縣在2009年吸引的人口數量為3.9萬人。台北市土地價格和房子的價格上漲的結構非常特殊，與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情況完全不同。中國大陸由於經濟的發展使得民衆手頭的資金大幅增長，並且在2004年前大部分的民衆都已經購買了房子，很多的公有房子都被私有化，只是使用權為八十到一百年間。2009年當世界進入全面性的金融危機之後，世界性的投資型資金大量的投入到中國，並且在中國置產，大陸房地產問題就變成不完全是民衆買不起房子的問題，因為有一部分民衆可以不用買房。

不可放縱房價上漲

2009年中期，當台北市的樓價快速上漲時，很多的名嘴都認為全台灣的房價還沒有任何的提升，只是台北市的房價提升而已，並且台北房價的提升有助於未來當兩岸簽署ECFA後，大陸民衆到台灣購房時，台灣方面可以賺大錢。很多媒體都在報道，因為台灣政治形勢複雜，大陸民衆到台灣炒房的可能性為零時，這種觀點還大行其道，令人費解。

對於台北地價高速上漲，東森電視台的劉寶傑主持人對此持續追蹤，這一題目已經連續討論了兩個星期。到東森電視台的名嘴最後都認為是馬英九行政單位失職的表現時，這一現象已經開始影響年底的五都選舉。

台灣民主化過程中，選舉主旨出現的問題最嚴重。首先當台灣省省長進行直選後，迫使台灣領導人也面臨直選的壓力，但選舉的目的為何才是選舉的關鍵因素。在兩岸因選舉而產生的危機中，台灣選舉成為對抗大陸的基本手段；另外，李登輝將選舉由民主常態，改變為只要選舉後就會成為民主的地方



中央政府對這個約佔農民工總數60%的年輕群體的高度關注，為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釋放出積極信號。

歐豬五國危機只是餘波

□黃康顯



歐盟成立之初，本來是富豪大飯局，成員國的人均生產值，一般都在全球首二十名內，由面和心不和的德法英三國拉頭纜，目的是和美國抗衡。在蘇聯解體以後，變成二分天下。其後東西德合併，分薄了德國的財富，法國的經濟，長期不濟，如是英國的經濟，領前於德國、法國。英國與美國，由於是沙煲兄弟，影響到美歐的抗衡。

歐盟擴大以後，便出現一個地中海俱樂部。包括希臘、意大利、西班牙，在地中海的北部，再拉來一個與西班牙為鄰的葡萄牙。無論是民族性格，抑或經濟模式，以至財富規模，它都和中歐與北歐有很大分別。到了這個階段，歐盟以內，並非人人富豪。

歐盟「發大」猶如發酵

到了最後階段，是歐盟的「發大」，猶如加以酵粉，使歐盟的體積增大，但並不一定財富增加。因為東歐諸國大部分是窮國，工業雖然發展，但國民經濟並非發達。在蘇聯時代，捷克是一個火車頭，但到了今天，波蘭與匈牙利較為落後，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更不理想。它們最好的出路是攀上歐盟，登上致富的列車，因此只可稱為跟班大雜會。

至於東歐更東，是一些脫離蘇聯以後、獨聯體以內的一些東歐國家，經濟實力更差，對歐盟來說，會是一種負擔，因此目前來說，加入歐盟的機會不大。至於中亞一帶諸國，情況更差，不值歐盟一顧。

今次出事的是地中海俱樂部的四國，再加上愛爾蘭，被戲稱歐豬。歐豬五國今次又會不會向西破壞，牽連到富豪俱樂部，往西散布，牽累東歐諸國，引發另一場的金融海嘯，使本來已經出現的經濟衰退產生雙底效應呢？

首先要解釋，何謂地中海俱樂部。自葡萄牙、

意大利、希臘與西班牙加入歐元區以後，經濟出現空前的繁榮。在信貸危機出現前的十年，美國樓價的升幅不到一倍，英國超過一倍，但西班牙的升幅竟然遠超於英國，其他三國的市場曾經活躍起來，消費亦突然增加起來，奢侈品的銷路亦立即興旺起來，換模換車變成一種時尚。

筆者去年在馬德里，竟然感覺不到金融海嘯的威力，以往並不富裕的雅典，高級餐廳與商店竟然其門如市。究竟原因是什麼？

是三高兩低——工資高、財赤高、債務高，是利率低，但效率亦低。自一九九九年歐元面世，歐洲央行實行低利率政策，使本來經濟已經落後的西班牙、希臘、葡萄牙、意大利可乘低息的大氣候，大舉借貸，來刺激樓市，促進消費。如是貨幣的流通量與供應量亦突然增加。增加的結果，是工資提高，與此同時，是債務的升高，財赤亦升高，但工作的效率仍然偏低。

禍首希臘進退兩難

結果形勢急轉直下。本來歐盟有一個規定，就是國家的財赤，不能超過全國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同時亦限制舉債的習慣。上述四國，完全有南歐人的德性：不守規矩，佔全國生產總值的欠債率與財赤率都偏高。在葡萄牙，分別是百分之七十七點四與九點三，西班牙百分之五十四點三與百分之十一點四，意大利是百分之一百二十與百分之五。相比之下，希臘的情況最為嚴重，欠債率是百分之一百一十三，與意大利不相伯仲，但財赤率是百分之十二點七，比西班牙更為嚴重。

至於被列入歐豬五國的愛爾蘭，情況又如何呢？愛爾蘭的財赤率，經過一年內的緊縮政策，仍然高企於百分之十一點七，但效果是相當不俗。因此在未來一年，會有下降的趨勢，且不若其他歐豬四國，一經緊縮，便出現罷工與抗議的風潮。愛爾蘭的欠債率，亦不算太嚴重。在過去，愛爾蘭的經濟基調亦遠遠高於其他歐豬四國，人均生產值高達四

萬美元左右，在全球的排名是十名以內，遠高於美國，比意大利、希臘與西班牙，高出兩成有多，比起葡萄牙，更高出一倍左右，因此有家底，亦可賣家當。何況愛爾蘭人以刻苦耐勞見稱，不若南歐人的「好食懶做」，因此所謂歐豬五國，應改稱歐豬四國。

四國中的禍首，是希臘，有二百億歐元的債務快將到期。為了取得歐盟的援助，希臘宣告大幅開源節流，一方面公務員減薪與減津貼，提高退休年齡，另一方面加燃油稅，引發國內強烈反對，掀罷工風潮，可謂進退兩難。

根據「馬城條約」，其中的不拯救條款，禁止成員國承擔他國債務，亦防止成員國的財赤問題波及他國。若然希臘向國際貨幣基金會求助，則有損歐盟聲譽。歐盟中最有能力及最應當出手的是德國。若德國出手，不知德國人會怎想，而希臘人會說：「德國軍隊又回來了。」更有損希臘的主權與尊嚴。因此歐盟是進退兩難。

德國豈能袖手旁觀

幸好去年通過的「里斯本條約」，其中的一二二條：當某成員國因天災或出現失控事故而陷入絕境，歐盟可提供財政援助。今次希臘的財政失控，可解釋為陷入絕境，亦可解釋到歐盟為何會突然宣告撥出二百五十億歐元，去援助希臘。

歐豬四國的地中海俱樂部，歌舞升平過後，結賬時一共欠下經常賬赤字多達一千零二十億歐元，而德國卻坐擁經常賬盈餘八百億，其中一半以上來自歐元區內的貿易，以歐豬四國為最大比例。四豬若病倒，就等於是德國的損失，而這一千零二十億歐元，只不過是德國的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六，可以說是「濕濕碎碎」，因此德國是有必要、亦有能力去援助四豬。對德國來說，豈能袖手旁觀。至於四豬以外的愛爾蘭，由於美國投資比重太大，美國亦豈能隔岸觀火。

作者為資深教授，博士



瞻養老人

□周 歡

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上，養老問題成為一個熱點，多名代表、委員就養老問題提出建議。日前，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表示，今年民政部將統一高齡養老津貼制度，全國80歲以上的老年人可享受津貼。

毫無疑問，這則消息讓人頗感欣慰。80歲以上的老人可享受高齡津貼，意味着社會養老問題進一步得到政策層面的改善，改革發展的成果將更多地惠及老年人這一弱勢群體。

瞻養老人，使之安享天倫，是中國人由來已久的優良傳統，同時也是整個社會努力的一個方向。從兩千多年孟子暢想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到現今政府部門提出的「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老有所樂」，無不體現着公眾對解決養老問題的願景。而老年人群體能否從物質和精神上得到社會應有的尊重，考量着一個時代文明程度的高低。「百善孝為先」，對於家庭個體而言，孝敬長輩、瞻養父母是一個家庭和睦的題中之義，也是一個公民不可推卸的義務。但對於社會整體來說，盡人子之孝、敬重老年群體，不僅涉及老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等現實問題，還與他們的社會地位和人格尊嚴密切相關。在此語境之下，尋求走出養老困境之路成為一道不可謂不嚴峻的社會課題。

去年12月初，民政部舉辦的第五屆全國老人院院長論壇指出，截至2008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已經達到1.69億，約佔總人口的12%，且每年以近1000萬的速度增加，80歲以上的老年人1805萬，約佔老年人口總數的11.29%。老齡化勢頭的加速、高齡人口的激增，考驗着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程度，也是對政府部門以人為本理念貫徹落實狀況的一次「集中檢閱」。

連日來，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多次強調「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這一觀念的提出，是對政府部門過去作出努力的肯定，同時也給今後的工作重點指明了方向。明細到養老問題上，就是要創造條件切實解決社會養老中存在的種種難題，讓老年人群體老有所養，過得更踏實、更有保障、更有尊嚴。

常言道，善待今天的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我們。只有讓老年人得到社會的優待和尊重，他們的「幸福指數」和「尊嚴指數」才不致被矮化。

分好蛋糕

□江德斌

九三學社中央提交的關於優化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提案顯示，目前我國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指數已經達0.46，遠遠超過警戒線，10%左右的家庭佔有了45%的城鎮居民總財產。提案認為，我國收入分配結構失衡的一個原因是勞資機制不健全，勞動者工資僅佔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遠低於發達國家的50%。

如何調節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使國民都能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成為兩會的熱門議題，也是民衆最關心的話題之一。而問題的實質，就是收入分配不均衡，導致貧富差距過大，並帶來社會不穩定的隱患因素。

從九三學社的提案看，10%的家庭切走了近一半，剩下的一半「蛋糕」由90%的家庭來分，明顯是不夠的。同時也說明現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存在很大的弊端。

目前，我國絕大部分勞動者的收入，主要來源於工資所得。支撐我國經濟發展的優勢之一，就是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低工資曾經是企業降低產品成本、生產低價商品利器，也是最大的競爭力。但是，長期保持低工資，則不利於國內消費市場的健康發展，更是對勞動力的廉價剝奪。從經濟發展和緩解社會矛盾來說，重新調整分配制度，重點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已經迫在眉睫。

要解決收入分配問題，需要採取雙管齊下的方法。一方面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資收入，也就是提高初次分配比例。另一方面採用稅收手段，調節不同人群的收入。提高工資具有剛性特點，只能逐步高走，還需兼顧企業承受能力，不能步伐太快。稅收手段則較為靈活，也更容易進行政策調控。比如減免低收入人群的稅負，提高個人所得稅免稅額度；提高高收入者的個人所得稅，徵收奢侈稅、遺產稅等。